

学术探讨

《伤寒论》学派研究方法述评

广州中医学院 张 志 民

从晋·王叔和编次《伤寒论》使这一伟大著作得以流传以来,历代治《伤寒论》学者不下数百家。他们研究《伤寒论》的方法,各有特点,各有优缺点,对后世研究《伤寒论》走直径或走弯路,取得成就或倒退,各起着一定的影响。对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简介和分析,对今后如何研究《伤寒论》、如何更快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仲景学说,有重要参考价值。兹简介和论析于后。

宋·成无己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人。他的《伤寒明理论》从症状鉴别、以方类证的角度研究《伤寒论》。成氏,不论在注解方面和分类研究方面,都是《伤寒论》学派的先驱者,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明·方有执倡“错简”之说,大胆怀疑王叔和、成无己对《伤寒论》条文的编排而重新按他的看法进行编排。例如在《伤寒论条辨》中,他把成氏注本中卷一的《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辨痞湿喝脉证第四》等三篇移于六病篇之后,成为第七卷,把诸“可”与“不可”等八篇移列于最后的第八卷,并删去方氏认为是王叔和掺伪的《伤寒例第三》。同时又按“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寒”之说(后人称为“三纲”)把太阳篇条文重行排列整理。方氏这种不固旧说、大胆革新的精神冲破了他以前治伤寒学者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思想束缚,开创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各种不同的《伤寒论》研究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伤寒论》,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按方类证,按症类证,按药类证,按法类证四大类。兹将这四大类的代表著作及其研究方法分述于下。

一、按方类证的研究方法

按方类证,是按《伤寒论》所载113方归纳证候类型、整理条文,从而研究其组方及辨证规律的研究方法。唐·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可谓是最早运用这一研究方法者。书中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将《伤寒论》方证撰成两卷,但载方甚少,对后世影响不大。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方药论》亦可视为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著作,亦只载方二十一首,仅有方解而未列方

证条文。

运用“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取得较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较大者,当推清·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及徐大椿的《伤寒类方》。

柯琴的《伤寒论注》开始把《伤寒论》原文按方证重新排列,如太阳脉证13条、桂枝汤证39条、麻黄汤证26条……等。柯氏突出了按方类证的方法,把分散在《伤寒论》原书各经病篇的同类方证条文汇集在相应的方剂下。例如,吴茱萸汤主治条文有三,分列在阳明病篇(243)、少阴病篇(309)和厥阴病篇(378)。柯氏把这三条集中列在“吴茱萸汤证”条下而加以论注。这种方法使每一方的主证可从各条文中归纳起来而更为突出,且有利于使方证的证候较为完备和具体,便于临床上的应用。因此,柯氏完成这一研究方法体例是对《伤寒论》研究的一贡献。

在《伤寒附翼》中,柯氏按六经病顺序,分别作方剂总论,如《太阳方总论》等,辞简文短,提纲挈领,述各经病方之概要;然后逐一方解各经病方,并包括方证的主证、类方类证鉴别等。兹摘录其对猪苓汤方论一段如下,以示其貌:“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心烦不得卧,是上焦实热,宜黄连阿胶汤清之。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虚寒,宜白通汤以温之。此少阴初病而下利,似为虚寒,至六七日反见咳而呕渴,心烦不得卧者,此岂上焦实热乎?是因下多亡阴,精虚不能化气,真阳不藏,致上焦之虚阳扰攘,而致变症见也。下焦阴虚而不寒,非姜、附所宜;上焦虚而非实热,非芩、连之任,故制此方……。”确非一般方论水平。

柯氏亦难免有若干错误观点。如在《伤寒论注》半夏泻心汤方注中曰:“三方(指生姜、甘草、半夏泻心汤)分治三阳。在太阳用生姜泻心汤……在阳明用甘草泻心汤……在少阴用半夏泻心汤……”。笔者认为:此三泻心汤实乃一法之加减,为少阳并于太阴病方,柯氏强分其为太阳、阳明、少阳三经病方,颇为不妥。但总的来说,柯氏的错误只是极少数,正确观

点占绝大部分。它启示后学者:学习《伤寒论》重在掌握其辨证论治的精神,将其理、法、方、药应用在诊治各种疾病上,勿被古人“伤寒”与“中风”等框框所困等。因此,《伤寒来苏集》所载三书应是研究《伤寒论》者必须精读的参考书。

徐大椿的《伤寒类方》是柯氏《伤寒附翼》的发展和改进。《伤寒类方》不按六经病分类分列各方,而按方之药效以分类排列,合为十二类。例如他把发汗方剂列在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条下;把下法方剂列在承气汤条下(如三承气、大陷胸、抵当、三物白散等)等。这种分类方法较柯氏分得妥贴。例如成无己《伤寒论》注本及今统编教材,“三物白散”方证均列在太阳病下篇(141条),柯氏却把它移到《伤寒论注》、《伤寒附翼》的太阴方证内。这一移列法较徐氏分类法来说,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徐氏的《伤寒类方》与柯氏的《伤寒附翼》在“按方类证”这一研究方法上是基本相同的。在具体分类上,则徐氏为优。

运用“以方类证”法研究《伤寒论》者,除上述柯、徐二家以外,尚有明·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及日本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近年来有江苏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郭子光的《伤寒论方证新编》、张志民的《伤寒论方运用法》等书。他们虽然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都有各书的优点,值得学习参考。

二、按症类证的研究方法

按照症状分类,把具有同一主要症状的《伤寒论》方证条文归纳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叫“按症类证”法。“症状”,指在人体上出现的主观感觉或客观体征,如头痛、胸闷(自觉的)或咳嗽、下利、面赤色(他觉的)等,均是。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的症状群,在中医学叫证候。用112个《伤寒论》方名命名的证候叫“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白虎汤证等。方证是《伤寒论》一书归纳、分析证候时所独具的特点,它可以作为一个诊断单位来看待,同时也包涵着证候、病机、治法和处方等内容。

把《伤寒论》中具有同一症状的若干个方证条文汇集归纳起来,按六病(如太阳病、阳明病等)分类排列和整理,再应用八纲学说、六气学说、脏腑病机学说等分析这些方证在诊断和治疗上之异同的研究方法,叫做《伤寒论》按症类证的研究法。这一研究法也可名为《伤寒论》的症状鉴别诊断学,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起源,是《伤寒论》诸研究法中重要的一环。进行这一研究法,要采用归纳、分类、对比、分析、总结等几项程序。进行这一研究法的过程可以体验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

历代应用这一研究法研究《伤寒论》的著作主要有: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朱肱的《类证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陈尧道的《伤寒辨症》、吕震名的《伤寒寻源》、戴麟郊的《广瘟疫论》、杨璠的《伤寒瘟疫条辨》等。

《伤寒明理论》全书共四卷。卷一至卷三列《伤寒论》症状五十个,起发热,迄劳复,计五十篇。分析形证,辨别异同。例如第四十三“自利”云:“……伤寒自利多种,须知冷热虚实,消息投汤,无致失差。”文中汇集了《伤寒论》中具有下利症状的各条文,总结为属寒、属热、属虚、属实等各种类型,当用温法、分利法、攻泻法等。这种归纳各下利证条文进行对比分析,作出六经病分证和八纲分证的诊断及相应治法的研究方法,对后人用症状鉴别诊断研究法来研究《伤寒论》,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明理论》中亦有不足的地方,如它同意桂枝人参汤证属协热利(“里虚协热则利”),把“大便溏小便自可者”视为“此为有热自利”等,这里不详论。

《伤寒百证歌》五卷,用100首七言歌诀对《伤寒论》的症状、脉、方药等从辨证角度,按八纲学说进行论析。在辨证中,许氏特别重视阴阳,谓“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自阴出;阳盛热多内外热,白虎相当并竹叶;阴盛寒湿脉沉弦,四逆理中为最捷;热邪入胃结成毒,大小承气宜疏泄”(《伤寒百证歌·总类歌》)。在《伤寒论》原书中,类证条文前后分散,许氏这样把主要的类证归纳起来,作提要、对比地论析,使读者眉目一清,朗朗上口。这说明许氏不但有丰富的临床实践,也有科学的治学方法,其对《伤寒论》辨证论治思想的普及,功大于成无己、朱肱等人。

三、按药类方的研究方法

从中药学的角度,把用同一味药的《伤寒论》方汇集而整理之,然后从配伍、用量的异同看其主治的变化,这种研究方法就叫“按药类方”法。

应用这一方法,先要练好两项基本功:一是做好“按方类证”的工作,二是进行“按症类证”的研究,未完成这两项准备工作,研究仲景的用药经验就比较困难。因此,从用药角度研究《伤寒论》的著作较少亦较晚出,主要有:黄元御的《长沙药解》,邹澍的《本经疏证》,周岩的《本草思辨录》。日本吉益东洞的《药征》及近人樊天徒的《对伤寒论用药意义的探讨》(《伤寒论方解》附篇)等。

黄元御的《长沙药解》对《伤寒论》、《金匱要略》的用药方法仅作了简略的研究。

邹澍的《本经疏证》载药173味,对各药在仲景方

中的应用规律,论述较详。其研究方法有合乎科学而可取的一面,例如他归纳了220条方剂用甘草的规律,“凡药者外而不内;攻者下而不上;温者燥而不濡;清者洩而不和;杂者众而不群;毒者暴而无制”等均用甘草为伍。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在分析药物性能时,邹氏用取象比类、运气生尅、五行学说作推理引伸,使今人较难接受。如“黄连根黄、花黄、实黄、皆具土色,四月开花,六月结实,七月根紧,适逢太阴湿土、阳明燥金主令之时,宜乎为脾胃之药矣”的论述难以令人信服。

周岩的《本草思辨录》载常用药物约130种,按《本草纲目》编次排列,对仲景方用药规律进行了论述。例如该书论吴茱萸曰:“呕吐有寒有热,不因少阳干胃,即属厥阴干胃。……仲圣小柴胡汤、吴茱萸汤分主甚明。”“温经汤有瘀血在少腹,而以吴茱萸为君,非以其能行瘀也,……肝中积结之气,非吴茱萸能辟去。此实是证之枢纽。曰温经者,纪其实也。”由此可见,周氏对《伤寒论》、《金匱要略》各条文主证、各方所用何药,都很精通。而其所论,较之《长沙药解》等,较有深意。

樊天徒的《对伤寒论用药意义的探讨》一文虽仅约七千字,但采用归纳、分析的方法,依仲景书中证、方、药三者相互间的关系来探讨仲景的用药法则较诸前人,尤为精辟。例如它阐述桂枝与芍药同用及单用之不同含义,麻黄与桂枝相配伍或分用的不同药效,麻黄与附子、石膏、连翘等药相合时的不同的适应证候及作用等,内容都很有见解,说明樊氏对《伤寒论》下过一番苦功。惜樊氏因故夭折,未能继续深入而系统地这一工作。

笔者壮年时曾有志于写一本研究仲景用药经验的书,已积初稿八十余篇,为征求意见而发表于当年各中医刊物者约十篇,如《谈谈张仲景的用药法则》(《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年10月号)、《张仲景用附子的研究》(同上刊,1957年6月号)、《张仲景用石膏研究》(《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3、4月号)等。后因时间所限而中断,原稿旋因“文革”而散失无存。

综上所述,“按药类方”研究《伤寒论》的方法是难度较大而又十分必要的工作。随着《伤寒论》方在临床上日益广泛的应用及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工作一定会在同道们的努力下完成。

四、按法类证的研究方法

自方中行《伤寒论条辨》后,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原文进行重新编排,其中有一种叫“按法类证”法。这种方法的代表著作是清·尤在

泾的《伤寒贯珠集》。建国后,统编教材《伤寒论释义》、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普及教材《伤寒论》、刘渡舟教授的《伤寒挈要》等著作都采用了这种按治法不同而分类排列原文的排列法。

现简介《伤寒贯珠集》“按法类证”法的特点于下:

该书在三阳病篇立各经病的正治法条文,太阳病和少阳病两篇分别立权变法条文,阳明病篇立明辨法、杂治法条文,厥阴病篇立清法和温法条文等。例如原文卷一的“太阳篇上·太阳斡旋法第三”先列“服桂枝汤后证治六条”,再列“发汗后脉证治法十五条”,其中先述:一、发汗后,阳虚,漏汗不止的桂枝加附子汤证;二、发汗后,营气不足、身痛的新加汤证;三、发汗后,心阳虚,心下悸欲得按的桂枝甘草汤证;四、发汗后,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等。这四证条文,在宋辑本中为原文第20、62、64、82等条,前后分散,未并列在一起,故读后不容易把它们联贯起来。尤氏将其排列在一起,便于读者领会到;误用汗法后,会产生阳虚漏汗、荣虚身痛、心阳虚心悸欲得按、阳虚水泛等四种病机和方证,有利于临床应用。

这一优点,为成氏《注解伤寒论》所缺,故任应秋教授倍赞尤氏对《伤寒论》条文的排列法是“超脱于方喻之外,不以风伤卫、寒伤营印定眼目,提纲挈领,明辨大法,千头万绪,总归一贯。”这说明,以治法为分类依据,对《伤寒论》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揭示其辨证论治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运用气化学说的研究方法

运用气化学说研究《伤寒论》的著作,主要有:张隐庵的《伤寒论集注》、张令韶的《伤寒论直解》及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

气化学说,主要指本、标、中见学说。它是把人体的病变与天地间的气候现象相类比,以“天人相应”作为人体病机和辨证论治的说理工具及内容概括,认为人体三阳三阴之经气(六经)与天地间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是内外相应的。人受病时,六气之邪侵袭机体,是本;在人体上表现为六经气化,是标;按六经络属之学说,相表里的另一方是中气(亦即“中见”)。

运用气化学说研究《伤寒论》的方法,在钱塘二张及陈修园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刘渡舟教授说:“气化学说源于《内经》的运气学说,经过伤寒家们的移植和发挥,用以说明六经六气标本中见之理,以反映六经为病的生理病理特点而指导于临床。”(《新中医》2:4,1983)请注意:“移植和发挥”及“伤寒家”这八个字。“移植”,指把《内经》的植物移植到《伤寒

论》的土壤上去了。“伤寒家”指仲景以后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如果仲景起死回生,问他:“你同意被人们移植到你书中的气化学说吗?”笔者认为,答复会是否定的。因为《素问》本身的六经概念与《灵枢》的十二经概念不尽相同;《伤寒论》中也未称六经病,原文只称“太阳病”、“阳明病”等六病,与《素问》、《灵枢》的六经概念相差较远,近年已有许多论文对此作详辨,不再赘述。既然不尽相同,仲景当然不会同意别人强加给六经的桂冠。刘老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充分体现了气化学说是伤寒学中一门湛深的理论。……惜乎,一些伤寒注家囿于《内经》从本、从标、从中见之言,机械地以公式照搬,而去求气化的系统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这说明气化学说不可机械的照搬。

在气化学说中,还有“开、阖、枢”的提法。即“太阳为开,少阳为枢,阳明为阖;太阴为开,少阴为枢,厥阴为阖”。这一学说源出于《素问·阴阳离合论》。临床实践家多认为《内经》中的开、合、枢理论,说明了阴阳离合的关系、阴阳转化、互根等问题。《阴阳离合论》主要说明三阴三阳“经气”的转输,《伤寒论》未明确提过开、合、枢的说法,其六病也不局限在“经气”的病变上。李克绍教授在《伤寒解惑论》中对此作了考证和解惑。他说:“这(指开、合、枢)本来是古代建筑学上的一些名词,古人用于三阴三阳,其目的是以比类取象的方法帮助学者领会其大体意义。诚如丹波氏所云:‘且害蜚、枢持、关枢之类,为三阴三阳之称者,不过借以见神机枢转之义,亦无深义焉’。而有的注家,却偏偏就此传抄之误,在开阖枢上大作其文章,注《伤寒论》者尤其如此,结果把《伤寒论》越讲越玄妙,学者越听越糊涂。”

六、几点体会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伤寒论》的研究方法在不断创新和完善,推动着《伤寒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自王叔和编次、成无己注解、方有执改革以后,不但为后世保留了《伤寒论》的基本原貌和初步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进行多侧面地研究《伤寒论》开辟了途径。以《伤寒来苏集》为代表的按方类证法、以《伤寒百证歌》为代表的按症类证法、以《本草思辨录》为代表的按药类方法、以《伤寒贯珠集》为代表的按法类证法等研究法,实际是从方剂学、症状鉴别诊疗学、中药学、治则治法等各个侧面对《伤寒论》进行的多学科的研究,这标志着《伤寒论》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它不但使《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系统化,更突出它的理、法、方、药的联贯性;而且还丰富了其他相应学科的内容,加强了各学科间的相互

渗透和联系。这种在高层次上相互融会及在低层次上逐渐纵深的趋势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态是相一致的。

2. 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应该提一下《伤寒论》与温病学说有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作用。在宋、元时代,温病学说得到发展。它的发展是在若干中医学家批评《伤寒论》的理、法、方、药不适应于温病的诊治的争鸣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到明、清时代,温病学说已从发展到成长。今天,我们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也已有不少论文发表,说叶天士、吴鞠通是善用《伤寒论》方者,这里不详举。但有一个事实,要提醒大家一下,即:这些发展都与研究方法有关。举一个例子:“按症类证”法,在开始时是专用在《伤寒论》研究上,例如《伤寒明理论》、《伤寒辨证》等。到明、清时代“按症类证”法已被推广应用到《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合并研究上,例如戴麟郊的《广瘟疫论》和杨榕的《伤寒温疫条辨》两书就是采用“按症类证”法来研究如何辨“伤寒”病与温病的。在今天,又有不少人认识到,且已有不少论文发表,认为:应从温病学说结合临床实践才能进一步认识和更好的阐述《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其代表人物如万友生、时振声两教授,其代表作如万氏的《欲识厥阴病,寒温合看明》(《福建中医药》5:3,1982),《寒温统一论》(《辽宁中医杂志》1982年10月号~1983年5月号)。这说明:今天人们对《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认识,较之明清时代,又有飞跃的提高。其能飞跃提高认识的因素较多,其中之一,是正确的采用了较有成效的《伤寒论》研究法。

3.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精进,目前从多学科研究《伤寒论》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伤寒论》的体质学说,《伤寒论》的时间医学、气象学思想,《伤寒论》的辨证法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应用电子计算机对《伤寒论》辨证体系的研究,《伤寒论》方药的实验室研究等都方兴未艾,它们从理论、实践和科研等三方面丰富了《伤寒论》学术思想,为《伤寒论》的研究工作开辟广阔的远景。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总参古今《伤寒论》学派治学方法的发展史,按方类证,按症类证,按药类证,按法类证等研究方法之所以得到充分的发展,为今人所赞赏,其原因在于这些方法紧密结合临床诊治实践。反之,那些但求理论上说得过去而较难结合临床实践的东西,则赞同者较少,必趋淘汰。

最后一句话,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要能够真正把《伤寒论》的理、法、方、药用在病人身上起救死扶伤作用。